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

辽代陶瓷 鉴定与鉴赏

李红军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主 编:耿宝昌

副主编:陈 政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莉英 叶文程 朱伯谦 任世龙

刘 杨 汪庆正 李辉炳 张浦生

余家栋 陈 政 赵青云 耿宝昌

总策划:陈慧荪

策 划:刘 杨

首批丛书书目

- 《越窑瓷鉴定与鉴赏》
- 《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
- 《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
- 《唐三彩鉴定与鉴赏》
- 《龙泉窑瓷鉴定与鉴赏》
- 《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
- 《汝窑瓷鉴定与鉴赏》
- 《定窑瓷鉴定与鉴赏》
- 《钧窑瓷鉴定与鉴赏》
- 《磁州窑瓷鉴定与鉴赏》
- 《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
- 《建窑瓷鉴定与鉴赏》
- 《德化窑瓷鉴定与鉴赏》
- 《官窑青花瓷鉴定与鉴赏》
- 《民窑青花瓷鉴定与鉴赏》
- 《景德镇彩绘瓷鉴定与鉴赏》
- 《景德镇颜色釉瓷鉴定与鉴赏》
- 《景德镇青白瓷鉴定与鉴赏》
- 《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
- 《宜兴紫砂鉴定与鉴赏》

注:○标记为已出版书目

序

我国陶瓷历史悠久，古陶瓷深受世人青睐，国内外倾其毕生精力搜集、珍藏、探索和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研究和保护力度的加强，有关部门对一些历史名窑相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与整理，所掘精品迭出，弥补了古陶瓷鉴赏中历史资料之不足。一些古陶瓷研究与鉴赏中的难题，也随着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迎刃而解。不少文物专家、学者，毕其一生着力于一个窑口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江西美术出版社从需求和可能出发，策划出版《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以各窑系、窑口古瓷的鉴赏命题，约请各方专家著述，这对于系统介绍唐宋以来各名窑名瓷详情、弘扬传统文化，实为可贵。每部书稿资料翔实，论述周详，剖析精微，相形于时下众多泛泛而论的鉴赏之作，实为述而有纲，言而有物。垂注于古陶瓷的鉴赏者如能从一个窑系、窑口的研究出发，触类旁通，这也是古陶瓷鉴赏的一条门径。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补史料之缺，应大众之需。编撰者已经辛劳数年，今观新篇，欣慰之至，志此数言，是为序。

耿宝昌

于北京

一 引言	(1)
二 辽瓷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4)
(一) 辽瓷研究的历史	(4)
(二) 辽瓷研究的现状	(5)
三 辽国的建立和辽瓷的烧造	(8)
(一) 辽国的建立	(8)
(二) 辽国制瓷业的产生	(9)
四 辽国的制瓷窑场	(14)
(一) 辽代的瓷窑及其产品	(14)
(二) 辽代关内与关外瓷窑产品的差异	(31)
(三) 辽代的官窑	(33)
五 辽代的陶瓷器	(35)
(一) 辽代陶瓷器的品种	(35)
(二) 辽代陶瓷器的器型	(36)
(三) 辽代陶瓷器的胎、釉	(59)
(四) 辽代陶瓷器的装饰技法和纹饰	(60)
(五) 辽代陶瓷器的烧造工艺	(66)
(六) 辽代陶瓷器的款识	(69)
六 辽代陶瓷器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71)
(一) 分期的时间断限和各期的产品特征	(71)
(二) 鸡冠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76)
(三) 注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93)
(四) 盘口长颈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96)
(五) 凤首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98)
(六) 盘口长颈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01)
(七) 喇叭口长颈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03)
(八) 盘口穿带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05)
(九) 鸡腿坛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07)
(十) 盆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10)
(十一) 渣斗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13)
(十二) 长颈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15)
(十三) 喇叭口瓜棱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18)
(十四) 盘口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20)

(十五)	葫芦形执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23)
(十六)	魁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24)
(十七)	鉴耳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	(125)
七	辽瓷与中原相关窑场瓷器的鉴别·····	(128)
(一)	辽代白瓷与定窑白瓷的鉴别·····	(128)
(二)	辽代黑瓷与定窑、磁州窑黑瓷的鉴别·····	(140)
(三)	辽窑白釉黑花瓷器与磁州窑的白釉黑花瓷器的鉴别·····	(141)
(四)	辽代青瓷与耀州窑、临汝窑青瓷的鉴别·····	(143)
(五)	辽三彩器与唐三彩器的鉴别·····	(144)
(六)	辽三彩器与宋三彩器的鉴别·····	(150)
(七)	辽三彩器与金、元三彩器的鉴别·····	(154)
(八)	关于辽三彩产生时间的探讨·····	(156)
八	辽代瓷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及其美学特征·····	(160)
(一)	辽代瓷器的造型艺术·····	(160)
(二)	辽代瓷器的装饰艺术·····	(165)
(三)	辽代瓷器的美学特征·····	(171)
九	辽瓷赝品与辨伪·····	(173)
(一)	辽瓷赝品的历史与现状·····	(173)
(二)	辽瓷赝品的特征·····	(175)
(三)	制造辽瓷赝品的方法及识别·····	(183)
十	对辽代陶瓷反映的问题的讨论·····	(186)
(一)	从辽代陶瓷看辽代的宗教形态·····	(186)
(二)	从辽代陶瓷看中原汉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	(187)
(三)	从辽代陶瓷看辽代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	(189)
(四)	从辽瓷瓷器类的变化看辽代契丹生活习俗的改变·····	(190)
(五)	从辽代陶瓷看辽代的文体活动·····	(191)
(六)	从辽代陶瓷看契丹族的“髡发左衽”·····	(191)
十一	辽瓷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及其贡献·····	(193)
十二	辽代陶瓷的价值·····	(200)
(一)	辽代陶瓷的研究价值·····	(200)
(二)	辽代陶瓷的经济价值·····	(201)
十三	对今后辽瓷研究的展望·····	(204)
十四	彩色图版·····	(217)

一 引言

如果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的话，那么瓷器就是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远在 8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即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殷、商时期，开始生产并使用青瓷。诚然，这个时期的青瓷还处于陶与瓷之间的状态，还不够成熟，还处于瓷器的初级阶段，而被世人称作“原始青瓷”。但它毕竟已经从陶器中脱胎出来，是由陶到瓷的蜕变，是一种质的变化，并预示着成熟瓷器的出现和人类瓷器时代——人类物质文化更加文明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到东汉时期，成熟的青瓷终于产生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自东汉成熟瓷器产生以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唐、辽、宋、金与元、明、清，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制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陶瓷文化，精美绝伦的中国陶瓷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图 1）。

然而，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产品，虽然也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近年出现了“辽瓷热”，国内外公私单位和收藏家争相购



图1 辽墓壁画“契丹婴戏图”

买，但“因以往出土较少，加之某些民族偏见，除确有纪年及民族特征者外，常被误为其先后之物，或被当作同类名窑次品，甚至熟视无睹，不予重视”（图2）^①。因此，相比之下，对辽瓷的研究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又由于“辽瓷热”导致大量的假辽瓷充斥市场，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对辽瓷的深入研究亟待加强。本书拟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辽瓷作一全面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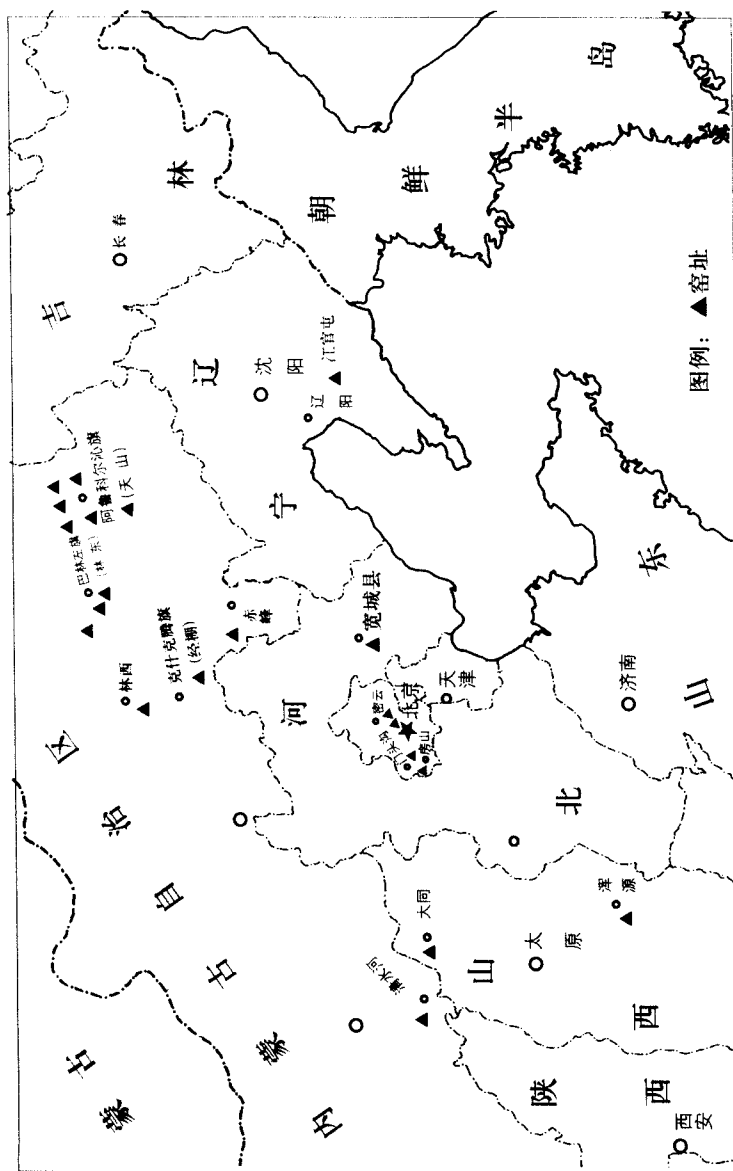


图2 辽窑分布图

二 辽瓷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辽瓷研究的历史

“辽瓷”是辽代陶瓷的简称，这一称谓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此前未见诸文献记载。1933年伪奉天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在沈阳成立，在整理和制定陈列大纲时正式提出了“辽瓷”称谓。

20世纪30年代前，人们不知何为辽瓷，偶有出土即被视为辽、金或元代物，或误认为是相关名窑的次品。直到1930年辽代永庆陵被盗，辽瓷才初露端倪。永庆陵是辽景宗、圣宗和兴宗三代的帝陵，由于伴有帝后的哀册出土，故给同出的陶瓷器提供了确切的年代依据，并为此前定错了时代的辽瓷和后来出土的辽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准。

伪奉天博物馆成立后，对原热河都统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原热河省境内盗掘的文物，包括其从辽永庆陵盗掘的哀册和其他文物（如白釉、黑釉、茶叶末釉、影青釉、绿釉、黄釉和三彩釉等陶瓷器）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这次整理除把鸡冠壶、鸡腿瓶（即鸡腿坛）和三彩器等少数几类器物确认为辽代物外，大量的陶瓷

器仍被定为宋或辽、金时期之物。

1937年以后,随着对辽宁抚顺大官屯窑、赤峰缸瓦窑、林东诸窑和辽宁辽阳江(gāng)官屯窑等窑址的发掘,辽瓷面貌逐渐明晰起来。但由于这些窑场烧造的时间一般很长,其烧造历史多是由辽代始烧,历经有金一代,至元代时才停烧,往往辽、金、元三代器物并存,加之墓葬资料匮乏,致使对辽瓷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却难以更加深入。

(二) 辽瓷研究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考古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辽代考古和辽瓷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20世纪50年代初期,辽重熙七年晋国夫人墓、赤峰大营子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国王墓、辽寿昌二年王翦妻高氏墓和辽宁义县(今属阜新县)清河门辽墓群等一批纪年辽墓的发掘,为辽瓷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我国著名学者金毓黻先生1956年发表的《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一文中,根据曾数次使辽的宋人富弼所著《富郑公行程录》中“富郑公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到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的记载,率先提出辽代有官窑,并对其地进行了考证,同时指出:“因此我推断凡有‘官’字的白色瓷器并包括其他白色瓷器在内,都是辽国官窑出品。”(《考古通讯》1956年4期)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根据当时仅有的一点考古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于1958年发表了《辽瓷简述》一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已发掘的辽瓷

考古资料，对辽代陶瓷的造型、胎釉、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特点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总结，指出辽代陶瓷包括契丹民族器型和中原器型两个系统，将鸡冠壶划分为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捏梁式和矮身横梁式五种基本形式。同时还指出了“官”和“新官”字款等问题是今后辽瓷研究的重要课题。李文信先生毕竟是辽瓷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辽瓷简述》一文构筑了辽瓷研究的基本框架，为后来的辽瓷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肯定和重视。^②

在事隔3年以后的1961年，李文信和朱子方二位先生又以辽宁省博物馆度藏的辽瓷为基础编撰了属于图录性质的《辽瓷选集》一书，书中收录了辽代瓷器107件，分门别类地排列，使人们对辽瓷有了较为全面和直观的认识。在该书的编后记中，作者着重介绍了几座重要的辽代墓葬和赤峰林东上京临潢府故城窑、林东上京临潢府故城南山窑、林东白音格勒窑（即白音戈勒窑）、赤峰的缸瓦窑和辽阳江官屯窑五处窑址及各窑的窑具、产品品种及烧造工艺，并根据鸡冠壶上保留皮囊容器装饰的多少和其底部状况对鸡冠壶进行了初步编年，指出扁身单孔式鸡冠壶是鸡冠壶的早期形式，圆身捏梁式鸡冠壶是鸡冠壶最晚的形式，而扁身双孔式和扁身环梁式鸡冠壶早于矮身横梁式和圆身环梁式鸡冠壶，虽然这种编年方法不够科学，但仍有一定合理性。在编后记的最后，作者根据文献资料进一步确认辽代有官窑，这是非常正确的，而且被后来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辽代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大批辽代遗址、墓群被调查、清理发掘，其中不乏纪年辽墓，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这为辽瓷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为辽瓷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辽瓷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学术界对辽代鸡冠壶的类型、编年和演变，辽代的官窑、带“官”或“新官”字款的辽瓷以及辽三彩鉴别等问

题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是已故学者阎万章先生在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的《辽的陶瓷》一文中,对辽代瓷窑的设置与烧造、辽代的制瓷工艺、辽瓷的造型与装饰及其相关的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并对辽代制瓷工匠的来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把矮身横梁式鸡冠壶的编年前提到辽代早期。

1994年10月,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赤峰市政府在赤峰市联合主办了“中国北方古陶瓷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标志着辽瓷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向大会提交了20多篇论文,对北京辽代龙泉务窑、赤峰缸瓦窑的产品和烧造工艺、鸡冠壶的分类分期、辽三彩和东北辽瓷的特点、晚唐及五代的白瓷与北方辽白瓷的比较以及辽代官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许多观点有很强的创见性。著名古陶瓷鉴赏家耿宝昌先生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辽瓷研究的历史和概况。这次会议的召开,对辽瓷乃至中国北方的古陶瓷研究无疑有重大的推动作用^③。

总之,对辽瓷研究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20世纪30年代辽瓷的提出到李文信先生的《辽瓷简述》一文问世为标志,构筑了辽瓷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为辽瓷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阶段,以阎万章先生的《辽的陶瓷》一文为标志,这个阶段主要是对辽瓷本身如鸡冠壶的编年分期和演变问题、辽三彩问题、辽代官窑问题等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三阶段,以1994年赤峰“中国北方古陶瓷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这个阶段对辽瓷及其所涉及领域的研究已全面展开,对辽瓷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涉及的相关领域越来越广,参与辽瓷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对辽瓷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 辽国的建立和辽瓷的烧造

(一) 辽国的建立

辽国是10世纪初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鲜卑族的后裔，从4世纪中叶起世代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游牧，逐渐形成了不够牢固的部落联盟，与中原的关系日益密切。唐初，在其地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任命契丹首领为都督。“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在东北地区的势力急剧衰落，契丹族的势力却日益强盛，尤以靠近汉族地区的迭刺部最为强大。唐末，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即后来的辽太祖，以武力统一了契丹部落，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称帝建立契丹国，建元神册，都城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后改称辽，并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辽国的辖地“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于是五京备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头下军州。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即东到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北到克鲁伦河，南到河北省、山西省北部的

广大地区。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1125年）为金国所灭，历经210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辽文化。

（二）辽国制瓷业的产生

契丹族建国前，契丹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的初期阶段，生产力极为低下，还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史·营卫志》）的生活。“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犷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湏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辽史·食货志》）。这种原始的不定居的生活决定契丹族在这个时期不可能有制瓷业。

考古资料显示，这个时期契丹人除了使用传统的皮囊容器和木器作日常生活器皿以外，主要是使用陶器和极少数的釉陶器。这个时期的陶器大体上有夹砂陶和泥质灰陶二类。夹砂陶主要是用作炊器的大口罐，泥质灰陶主要是用作盛贮器，器型有壶、瓶、罐三类，装饰亦极简单，仅篦点纹而已，素面无纹者占有相当的比例。总的来说，器型比较单调，缺少变化，在做工和制作工艺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然而，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的陶质，如夹砂陶耐高温，不易烧裂，故炊器使用夹砂陶制作；而泥质陶不耐高温，极易烧裂，所以一般只作盛贮器。这说明早期的契丹人已经掌握了不同陶质的不同属性，并能因材施教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辽建国后即具备了烧制瓷器的条件。

首先是烧制瓷器的技术人才问题。辽国制瓷工匠的来源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来进行探讨。

辽国初期的各种手工业工匠主要是由战争中掠夺的汉人和渤海人组成并发展起来的,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从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辽国的制瓷业匠人也是如此。

据文献记载,契丹在建国前后,曾经多次南侵。《辽史·肖阿古只传》载:“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辽史·王郁传》亦载:“天赞二年,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赵,攻下磁窑务。”《辽史·兵卫志》载:“(神册)六年……皇太子略定州,俘获甚众。”《辽史·记事本末》卷一载:“十二月癸丑,王郁率众来朝,太祖呼郁为子,赏赐其厚,徙其众于潢水南。太子率郁略地定州。”朱彝尊的《日下旧闻》载:“太祖略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太祖二年夏四月拔曲阳。”《辽史·地理志》:“天赞二年闰四月,攻下定州曲阳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衽多技巧。”《旧五代史·孙方谏传》:“后晋出帝开运三年,契丹夺定州城垒,烧焚庐舍,尽驱居民而北,中山为之一空。”(文中的“中山”即当时的定州。)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还有很多,不便一一摘录。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1. 河北曲阳县涧磁村是著名的定窑所在地。另据《曲阳县志》卷十下《土宜物产考》载:“白瓷,龙泉镇出,昔人所谓定瓷是也,以后兵燹废。”同书卷六亦载:“龙泉镇唐宋以来旧有瓷器,五代后周尚有瓷务税吏,宋时有瓷器商人,今废。”说明当时不仅是涧磁村、龙泉镇甚至曲阳县的许多地方都盛产瓷器。

2. 将《辽史·肖阿古只传》和《辽史·王郁传》的记载两相对照,可知“磁窑镇”和“磁窑务”实为一地。顾名思义,这里应有烧瓷的窑场。

3. 综观文献记载可知,契丹早期对中原地区战争的目的,并

不完全是为了夺取城镇、占领地盘，而主要是为了掠夺人口和财富，往往是“每略一地抢掠一空”，或“尽驱汉人北上”，或“尽驱人民入番”。所谓“入番”是指进入契丹故地自不必说，“北上”也是将俘获的人口北迁到契丹所占领的地区。这些被掠走的人口中有“有绫锦诸工作，宦官、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也理所当然地会有制瓷工匠，尤其是定州曲阳和磁窑镇的制瓷工匠被掠入契丹，这就为辽国制瓷业的产生提供了制瓷工匠和技术人才。

4. 据《辽史·地理志》载：“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就是说，契丹对通过战争掠夺来的汉人的一贯做法是将其迁往异地，设置新的州县，新州县仍因袭原住地的名称。如同书载“辽太祖天赞初攻燕蓟，以所俘汉人建临潢县，俘蓟州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蓟州吏民建渔阴县，俘檀州民，建檀州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就是例证。按此惯例推测辽代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很可能就是由河北曲阳龙泉务（亦即龙泉镇）的制瓷工匠组建的。可见不仅辽国的制瓷工匠是契丹由中原地区俘掠来的，而且辽国有的瓷窑很可能就是直接由中原的制瓷工匠组建的。

其次是物质生活的需求，这是辽国制瓷业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远在唐末之时，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为了躲避战乱，“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加之契丹在建国前后数次南侵，从中原地区俘虏了大批人口，使大量的汉人流入契丹。

从耶律阿保机时代就开始建筑城郭，来安置俘获的汉人，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并允许诸王、外戚和大臣以从征所获的汉人建立州县，称为“头下军州”。阿保机晚年灭掉了东北方面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又从后晋夺取了燕云十六州。“……于是五京备焉……总京五，府六，州、郡、城百五十

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辽史·地理志》）。这时的辽国境内，除了“畋渔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以外，还有大量的“耕稼以食，城郭以居”的汉人和渤海人，他们需要大量的陶瓷器以供使用。契丹人在汉人的影响下，转向定居生活的人口急剧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生活器皿的改变，迫切需要设置窑场烧造瓷器，以供民需。特别是契丹统治者和贵族阶层，他们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接触和征战中原的过程中，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汉族生活方式的熏陶，原有的木器、皮囊器和泥质陶器，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也迫切需要大量高档的陶瓷生活器皿，以供享用，这种举国上下的迫切需求，为辽国制瓷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再次是在契丹统治的广大地区，有丰富的瓷土资源、水和燃料，具备烧瓷的物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辽国的制瓷业便应运而生。

辽国究竟何时设窑烧瓷，未见文献记载，但从契丹建国前后即从中原掠夺大批制瓷工匠的情况，以及窑址和纪年墓葬的出土物来推测，辽国的制瓷业在其建国初期就已经产生了。

在辽代早期的纪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十分精细的辽瓷：

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是一座辽代早期的墓葬，根据所出墓志的记载，可知其埋葬时间是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此墓出土瓷器近60件，绝大部分是辽窑烧制的产品，仅鸡冠壶一类就有17件之多，其中有白瓷平底鸡冠壶4件，圈足的8件。^④从瓷器演变规律来分析，这两种形制的鸡冠壶似乎并非是一时期烧造的，一般说来，平底的应比圈足的早些，这期间应有一段时间的演变过程。经观察，此墓出土的鸡冠壶及其他辽瓷，其工艺成熟，技艺精湛，做工精细，不是初创不久的瓷窑所能做到的。肯定要有一段时间的烧制历史，才有可能做到。

北京南郊发现的辽北平王赵德钧夫妻合葬墓，合葬的时间是